

地域文化探源

南明鲁监国政权与慈溪地域

周忠庆

大明王朝覆亡后，明朝宗室以抗清复明为号召，自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南方各地建立了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监国政权、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前后历时十八年，因为沿用大明国号且活动地域主要在南方，故而史称南明。

在鲁监国政权中，慈溪地域的前明朝臣孙嘉绩、沈宸荃、熊汝霖和冯元颺成为朝廷的核心成员，在慈溪地域乃至于浙东地区的反清复明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鲁监国政权被迫驻蹕舟山期间，慈溪人王翊、王江和冯京第建立抗清山寨的四明山区，成为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区域。

一、鲁监国政权核心：孙嘉绩、熊汝霖、沈宸荃、冯元颺

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县人沈宸荃、熊汝霖、孙嘉绩起兵抗清。”沈宸荃（1615—1652），字友荪，号彤庵，慈溪师桥昭十三房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熊汝霖（？—1648），字雨陞，余姚孝义乡熊家村（今慈溪市周巷镇熊家村）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孙嘉绩（1604—1646），原名光弼，字砥庆，余姚孙家境（今属于慈溪市）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

孙嘉绩领导的余姚县起义，揭开了浙东地区反清复明运动的序幕。

南明弘光政权覆亡后，清军继续南下，余姚知县王日俞弃官逃亡，训导王元如自署县事，准备投降清廷。孙嘉绩毁家纾难，招募乡勇数千，和熊汝霖一起率健勇突入余姚县署，擒斩了王元如。然后，孙嘉绩整顿乡勇，编成义军，军分两营，邀同县熊汝霖主右军，自主左军，并遣使广告会稽、鄞县”。

沈宸荃和冯元颺在慈溪县同时起兵抗清。冯元颺（1613—1645），字沛祖，号眉仙，慈溪城东（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

此外，章正宸、郑遵谦在绍兴斩杀降清官吏，宁绍台道于颖招募二千士兵响应；钱肃乐和董肃宁在鄞县起兵；慈溪知县王玉藻、定海知县朱懋华、奉化知县顾之俊、鄞县知县袁州佐、象山知县姜祈募义兵反清。弘光政权镇海将军方国安率一万军士至钱塘江东南，和定海总兵王之仁部组成浙东抗清的军事主力。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鲁王朱以海被浙东各路抗清义军恭迎至绍兴，拥立为监国，建立以浙东为中心区域的鲁监国政权。显然，鲁监国政权是靠孙嘉绩、熊汝霖、沈宸荃、冯元颺、钱肃乐、章正宸等具有民族正气的前明官绅，以及百姓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慈溪地域由此归属鲁监国政权。孙嘉绩、熊汝霖、沈宸荃、冯元颺等慈溪地域的前明官员成为鲁监国政权的核心成员。

孙嘉绩任兵部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旋即升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总视义师；熊汝霖升金都御史，督师江防；沈宸荃擢右金都御史督师，继而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冯元颺授太仆少卿，晋升右金都御史。

鲁监国政权建立后面临三件紧要事务。

首先，阻止清兵继续南下，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反击，以收复失地，恢复大明。

其次，整顿鲁监国政权的军事力量，提高军队战斗力。

鲁监国政权军队分为两路，即正兵和义兵。方国安、王之仁部队和浙东原有营兵、卫军统一编制为正兵，驻守金华、富阳、桐庐等地，为鲁监国政权所倚重，粮饷充足，但纪律松懈，常常“饱嬉江头”。孙嘉绩、熊汝霖、沈宸荃等人临时招募的军队称为义兵，在装备、军饷和军事训练上处处劣势，常常缺粮乏粮。“寻定分地分饷之议，以国安兵最多，之仁次之，乃以为正兵，取宁波、绍兴、台州三郡田赋以给；而义兵取富室之乐输。沈宸荃为了加强防务，在舟山修筑城堡和坚固的军事工事，将舟师驻扎在东南水门外，以确保舟山城防安然无恙。“鲁王朱以海曾在鲁监国四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到鲁监国六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全力经营舟山的抗清基地，在鲁王

尽管如此，支撑鲁监国政权局面最坚定的力量依然是义军。孙嘉绩毁家解决粮饷短缺，他说：“身体是先天留给我的，就应该与国家共存亡。怕只怕举事不成，死后无颜面对君亲！”孙嘉绩部将章钦臣善于制作火器，所部号称火攻营，是鲁监国政权西征时的精锐部队。孙嘉绩与熊汝霖率领义兵驻兵瓜里，协防江岸，每次作战都是熊汝霖当先、孙嘉绩殿后，人称“孙熊兵”，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孙熊兵”曾渡过钱塘江与清军作战，在与清军将领瑚密色和骑都尉色赫的交战中，“（熊）汝霖兵殊死战，瑚密色中枪战死。”清军溃败。

为进一步加强鲁监国政权的军事力量，熊汝霖到海宁等地招募兵员。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督师江防，屡战不胜。汝霖认为‘江面迎攻甚难，不如间道入内地为攻心策’，遂率千人至海宁，招募兵员，万人响应，号称‘熊军’。”成为鲁监国政权中的一支生力军。

再次，处理和南明隆武政权的关系。

在鲁王朱以海被拥立为监国之前，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史称隆武帝。于是，在时局混乱、消息不同的状况下，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隆武帝遣使携十万赏银前往绍兴颁诏，希望鲁监国退位归藩，统一抗清力量，并许诺鲁监国政权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鲁监国政权中是否奉隆武政权为正统展开了激烈辩论。熊汝霖坚决反对接受隆武帝的诏书，他说：“主上原无利天下之意，唐藩亦无坐登大宝之理。有功者王，定论不磨。若我兵能复杭城，便是中兴一半根脚，此时主上早正大号，已是有名。较之闽中乘时拥戴，奄有闽越者，规局更难倒论，千秋万世，公道犹存。若其不能，而使闽兵克复武林，直趋建业，之功所在，谁当与争？此时方议迎诏，亦未为晚。”（徐芳烈《浙东纪略》）。于是，在回复隆武帝的信中，鲁监国称隆武帝为“皇叔父”而不称“陛下”，明确表示不承认隆武政权。

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越过钱塘江，进击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宁绍地区，鲁监国被迫离开绍兴，渡海前往舟山。孙嘉绩追寻鲁监国到舟山，劳累忧愤交集，因病辞世。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孙）嘉绩从乔司急回绍兴，航海至舟山追寻鲁王，疽发于背，于阴历七月二十四日死于舟山。不久，赐祭九坛，谥忠武。”

清军进入福建，隆武政权覆亡。鲁监国进驻福建长垣，重建政权，封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加东阁大学士熊汝霖太子太傅，司票拟。”（李聿求《鲁之春秋》）。熊汝霖成为鲁监国政权的内阁首辅大臣，随从鲁监国左右，协助处理军国事务。东阁大学士沈宸荃晋升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参与军事调度和指挥。鲁监国军队收复建宁、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连江、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福安、福宁等地，控制了福建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省会福州成了孤城。

正当福建抗清形势高涨之际，熊汝霖却遇害辞世。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鲁王驻闽安镇，郑彩擅权，骄悍不法。汝霖屡次仗义执言，郑彩恨之入骨。一夕，汝霖离闽安镇至琅琦，郑彩乘机派亲羽余人赶到琅琦。十七日夜，汝霖及其幼子被彩党缚，当晚被投入海中，惨遭杀害。”鲁监国获知熊汝霖被害后，哀痛不已，下诏罢朝五天，他怒斥郑彩道：“杀忠臣以断股肱，生何益耶！”

顺治六年（1649年），鲁监国移驻舟山，重新整顿朝政，沈宸荃被谕命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沈宸荃为了加强防务，在舟山修筑城堡和坚固的军事工事，将舟师安置在东南水门外，以确保舟山城防安然无恙。“鲁王朱以海曾在鲁监国四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到鲁监国六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全力经营舟山的抗清基地，在鲁王

的治理之下，舟山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然而当清军攻入舟山后却大肆屠城、滥杀无辜，使得原本繁华富庶的舟山几乎被夷为平地。”（龚剑锋、孙健：《浙闽沿海南明鲁王政权的失败原因和存在意义》）

而随同鲁监国来到舟山的冯元颺却遇难于舟山群岛。

鲁监国由福建初入舟山时，原隆武政权的肃虏伯黄斌卿拒不接纳鲁监国及其朝臣，鲁监国政权内阁阁员荆本仰由淞江抵达舟山，其子荆元相欲袭击黄斌卿，结果兵败被杀。同为鲁监国政权内阁阁员的冯元颺，“以和解，误为闽兵所杀。”（汪光复《航海遗闻》）

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攻入舟山城内，沈宸荃水师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败走海上，跟随鲁监国来到厦门。不久，沈宸荃随鲁监国移居金门。顺治九年（1652年），沈宸荃在南日山附近遭遇飓风袭击而辞世，年仅三十八岁。鲁监国闻知噩耗，极为悲伤，下谕谥号为节愍。

二、鲁监国政权外围：王翊、冯京第、王江

顺治六年（1649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即鲁监国政权经营舟山抗清基地期间，鲁监国接受沈宸荃等朝臣的建议，改变抗清战略，将重点放在经略浙江上。鲁监国政权联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冯京第等义师，同时遣使前往日本寻求援助，使舟山群岛以及横跨慈溪、余姚、鄞州、奉化、嵊州、上虞等县囊括整个慈溪地域的四明山区，成为浙东抗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区域。

王翊（1615—1651），字完勋，号笃庵，慈溪县人，早年“好言兵，见天下方多难，思以功名自见。”鲁监国驻蹕绍兴时，王翊和好友王江（？—1655，字长升，慈溪县人）组织义军归附，授兵部职方主事。鲁监国政权撤离绍兴移驻舟山时，王翊和王江回到慈溪地域招募民兵，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顺治四年（1647年），王翊和王江率部进入四明山区。王翊治军严明，能立纪纲，不骚扰山民百姓，并亲自安抚山中老老：“前此以诸将横扰，居民遂至激变，今吾军来，足为是山之卫，而无所扰。父老念故国，其许我乎？”王翊遂在形势险要的大兰山安营扎寨，自称大兰洞主，山民纷纷加入王翊队伍。冯京第率部来到四明山，与王翊会师，屯军土岙，军势日益壮大，“蔓延于四明一百里之内”。

冯京第（？—1654），字路仲，号簞溪，慈溪城东（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世人尊称为“簞溪先生”，明末复社名士，冯元颺从子。弘光政权覆亡后，冯京第归附福建隆武政权，授监军御史。隆武政权覆亡后，在湖州（今浙江吴兴）起兵，旋即进入四明山与王翊合军。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年）（冯京第）与黄孝卿乞师日本，未遂。次年与黄宗羲再乞师于日本，至长埭不得清而还。”关于冯京第乞师日本，清人朱溶所著《忠义录》的记载更为详细：冯京第到达日本后，向日方乞师，在江户幕府夜军德川家光府邸哭庭十四日，日夜不绝。德川家光就此事告知父亲德川秀忠，德川秀忠认为：明朝初年，胡惟庸谋反，明廷指责日本参与此事？诬我太甚。现在明朝灭亡了，日本又何必越过大海去兴兵戎之事。德川家光以此言告冯京第，冯京第无奈，只得返回中国。

顺治五年（1648年），王翊率部自四明山直入上虞，攻入上虞县城，杀死清廷任命的上虞摄令，整个浙东震动。清廷集中在浙兵力，全力打击王翊、王江和冯京第驻扎的四明山抗清山寨。浙江提督田雄在四明山附近的团练配合下，派兵越过清贤岭，突破杜岙关，偷袭山寨。冯京第不及防，伤亡四百多人，冯京第潜逃避居民舍，王翊率余部败走天台。王翊认为此次山寨失守是团练之罪：“北兵虽健，吾视其锐则避之、懈则击之，非团练为之乡导，彼敢行险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团练岂能相守？吾卒虽贱，其破团练尚有余力。”于是，王翊回师杜岙，沿途招募士兵达万人，大破清军团练，收复四明山抗清山寨。

王翊极具军事才能和管理才能，为巩固四明山抗清山寨，采取

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譬如，设立五营五司制度：五营主军，王翊亲自统领，五司主饷，由王江负责。实行“且耕且屯”“履亩而税”制度，在不增加四明山区百姓负担的情况下，解决了义军的军需供给问题。“四明四百八十峰之民，其粗赋不之官而之公，其谿狱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东列城昼闭，胥吏不复下乡，汛兵远伏，以相眺望，而不复近山。”（黄宗羲《梨洲遗著汇刊》之《四明山寨记》）

顺治六年（1649年），王翊率军大败清军，再占上虞县城，进军奉化。鲁监国派遣使臣巡视四明山，授王翊为河南道御史。黄宗羲认为授官太低，上疏鲁监国：“诸管文则自称都御史、侍郎，武则自称将军、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主上嘉其慕义，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张大，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时固为显要，而非所论于今日。诸管小或不及千人，大亦不过王翊一部。今品级悬殊，以之相临，恐为未便。”于是，鲁监国在健跳所（今浙江三门县东南）接见王翊时，授其右金副都御史，次年授兵部右侍郎，冯京第晋升兵部侍郎。顺治七年（1650年），王翊对冯京第说：“与我犄角惟舟山，我灭则舟山无援，而舟山危，我亦无救。”为保证舟山鲁监国政权的供给与安全，王翊同台州俞国望、绍兴陈天枢部相配合，率军攻破新昌和浒山，截断了宁波府和绍兴府之间清军的联系。

为了彻底消灭鲁监国政权，清廷决定先捣四明山、再取舟山岛。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兵分两路会攻四明山，“军帐弥漫三十里，游骑四出，仍用团练为向导。”王翊、王江和冯京第指挥义军扼守关隘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往舟山。清军继之攻打舟山。王翊奏告鲁监国：“事急矣，请复入山，集散亡以为援。”不料，欲前往奉化招兵以重整队伍的王翊，在北渡清军团练俘获。

闽浙总督陈锦亲自劝降王翊，王翊大义凛然道：“毋多言，成败利钝，天也，汝又何知！”并高歌绝命诗一首：“谈笑且从容，今朝得死所。一腔忠愤血，飞洒若红雨。”慨然就义，时年三十六岁。王翊牺牲后，头颅被清廷挂在宁波府城的西关门上以威胁抗清兵民。王翊友人为深夜偷偷地将其取下，藏匿家中。

冯京第继续尊奉鲁监国政权，坚持抗清。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顺治十一年被叛将杀于舟山”。当时清军袭击舟山，正患重病的冯京第藏匿于大岚巅顶山，被部将王升出卖而被俘，遂慷慨就义。王升卖主求荣，未得善终，最终被清兵杀死。后人将冯京第的一只手臂、王翊的头颅和董志宁的尸体，合葬于今宁波江北区翠柏路北段三忠巷一带马公桥旁，称三忠墓，二十世纪末迁至慈城大宝山。

王江在王翊牺牲后，曾一度削发为僧以作掩护，不久参加抗清名将张名振的部队，继续抗清。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与张名振引师入长江，又与沈炯伦聚众四明山，屡仆屡起。不久在与清军作战中，中流矢阵亡。人谓‘忠孝义烈智勇，无不俱备’。”

顺治八年（1651年），失去舟山抗清基地的鲁监国赴厦门依靠郑成功。次年，鲁王自去监国称号。康熙元年（1662年），鲁王在金門病逝。

随着鲁监国政权的覆亡，慈溪地域的反清复明运动逐渐沉寂，仅有零星的抗清斗争，已不成气候。

总而言之，慈溪地域在鲁监国政权期间的反清复明运动，自弘光元年（1645年）至鲁监国六年（1651年），共长达七年。虽然有某些历史学家全面否定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认为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腐朽的前明王朝，维护汉族官僚地主的阶级利益。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南明政权的抗清活动有着反抗“清初六大弊政”的积极意义。至于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更是不容否定。正是他们的坚决斗争，使清廷看到了汉族人民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调整政治政策，努力缓和民族矛盾，调整阶级关系，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康熙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溪上人物

《世间风雅》序

童银舫

在洪丕谟先生逝世十八周年之际，慈溪市博物馆将洪夫人姜玉珍老师捐赠的名家书画篆刻作品精选出版，这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现任馆长洪甜史史命我撰序，曾让我为难。一是觉得没资格，二是怕写不好。后来接到姜老师电话，才知叫我写序是她的主意，我只得从命。

洪丕谟先生是慈溪县洪唐人，1940年11月13日出生于上海。其父洪洁求曾留学法国，为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而洪洁求的外祖父就是晚清浙东著名书法家梅调鼎。堪称芝兰有根，醴泉有源。洪先生十九岁拜老中医廖慕韩为师，行医二十载，与海上文人诸如丰子恺、张大壮、沈柔坚、钱君匋、朱屺瞻、周慧珉等成知交。1981年毅然从医从文，应聘进入华东政法学院从事写作、古文教学和古籍整理工作，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

1984年10月，妻子徐凤妹病逝，让洪先生备尝人生之悲苦。为了寻求解脱，开始了读经礼佛生涯。1986年元月，天赐良缘，他与上海青年女教师姜玉珍结成连理，伉俪情笃，传为佳话。其后平均每年有五六部新著出版，姜玉珍更是他事业上的助手和伴侣，夫妻俩还合著出版了《古代女性世界》《结婚十年》等多部著作，他的写作生涯驶入了“快车道”，在读书界卷起一股“洪氏旋风”。他在学术研究和写作生涯中，无一不究，堪称通人，一生著述百余种，达二千万言。而他的书法，融豪气、清气、逸气、静气、书卷气于一体，人称“洪体”而独步书坛。然天妒奇才，2005年5月22日，洪先生走完了他那绚丽多姿的65年的人生之路。其传已载入《慈溪市志》、新编《宁波市志》和《浙江通志》。

洪丕谟先生生前对家乡充满感情，

红色之光

杨贤江的浙一师毕业纪念照

王孙荣

民国初年，绅商士子结社成风，每届特殊日期，往往合影留念。学校作为新生事物，得风气之先，但凡举行仪式、典礼等重要活动，集体照自然不可或缺，而学生在毕业前夕的同乡合影也随之成为一种联络乡谊的时尚。

民国四年（1915年）5月31日晚饭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杨贤江在校园内散步，看到不少同乡学子正合影留念，因此在当天的日记里感叹：“爱同乡之情，不过爱国、爱世之情之缩影。推而广之，其爱情弥漫无极。然有形式之爱至诚之爱。前者不可永久，后者乃亘千古、历万稔而不磨。吾不知今日之动辄摄影者，果为何种之爱歟？”仅隔一天，即6月2日下午，杨贤江便亲身体验了一回同乡合影：“摄吾姚师校同乡共六人之照。盖今夏四年级毕业马、崔二君亦在內也，有此庶可以志纪念。”一个月后的7月5日下午，杨贤江又“蒙舜五手招，啜酒食面”。当天日记有“舜五、器事二兄修业期满，行将赋归，余各赠以《四则问题解》一本，聊作纪念礼。蒙舜五复报以《英和新辞典》，卷帙甚厚，感甚兹焉。”的记载。马君即舜五，名启臣（1893—1970），柯东乡义学地（今属慈溪市宗汉街道周塘西村）人，毕业后历任余姚县视学员、余姚诚意高等小学校长、余姚县教育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建筑公司杭州木材厂厂长，1954年聘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员。崔君即器事，名友仁（1893—），后改名善工，余姚南城大黄桥树桥头（今属余姚市兰江街道舜南社区）人，毕业后历任余姚诚意高等小学、余姚县立高等小学教员。

光阴飞逝，转眼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6月，又临一年毕业季。这次杨贤江成为主角，一帧“浙江第一师校余姚同乡赠杨君毕业摄影”照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高而阔的石灰影墙上嵌着二面白色圆形花雕，左侧露出一绺白色的圆拱门坊，俨然是西洋装饰。照片上花枝扶疏，草本、木本、藤本错落有致，地栽、盆栽交相呼应，尽管看不出花的颜色，却开得争奇斗艳，充满了生机活力。最前面是用瓦片相向隔成的蜿蜒小径，虽然仅为方寸天地，却极具园林胜意。原木搭建的廊下倚坐着三名青春少年，从左往右分别是范鍾秀、黄宗正和沈宗汉，均着白色衫裤，除范鍾秀为前排吴克刚遮挡看不出穿什么鞋，其余二人都穿玄色自然口布鞋。坐于前排C位藤椅上的自然是杨贤江，板寸头，金丝眼镜，神情肃穆，上身微微右倾，双手互搭置于腿上，白色衫裤，黑色皮鞋，跷着左二郎腿，英姿勃勃，气宇轩昂。左边坐藤椅者是吴克刚，小平头，白色衫裤，玄色布鞋，跷右二郎

曾于2002年在慈溪举行“敬乡书画展”，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开幕式上，市长还聘请他为市政府文化顾问。随后，市政府决定筹建洪丕谟书法馆。2004年，洪先生向慈溪市博物馆捐献自己的书法珍品三十幅，印章、著作若干。他去世后，姜老师遵照其遗愿向家乡捐赠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书画精品七十幅。2008年，百幅书法精品在慈溪市博物馆展出，并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洪丕谟书法精品集》。2012年和2019年，姜老师又捐献洪先生珍藏的名人书画篆刻精品及手稿等，累计捐赠达一千三百件。这是何等的气度与胸襟？也充分表达了她对洪先生及其家乡的真挚感情和无私奉献精神。

2019年11月14日，位于慈溪市博物馆新馆的洪丕谟艺术馆开馆，同时常年举办“百尺竿头 坐看云起——洪丕谟先生成就展”，全面展示了洪先生在书画艺术、文学创作、佛学与道教、医学和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成就。

我和洪丕谟先生相识将近二十年，洪先生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亲人般的温暖。可以这么说，我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他的教诲和指引。洪先生的书法艺术、学术专著为社会各界所喜爱，所钦佩，他的人格更为大家所仰慕。在他的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谦恭、正直、知行合一的一面，又有艺术家追求完美、突出个性、不断超越的一面。他的勤勉、豁达、博学 and 卓越的才艺，可谓高山景行。

2021年11月，我将洪先生生前历次赏赐的五十部书稿和三十部校样全部转赠给慈溪市博物馆（洪丕谟艺术馆）永久收藏，以便学者研究。

我们期待洪丕谟艺术馆成为洪丕谟艺术的传播中心和研究基地，这是对洪丕谟先生最好的纪念和回报。

腿。左侧站立、右手倚靠扶栏的光头少年是陈鸿来，白色衫裤，黑色皮鞋。立于杨贤江右边、右手搁于太湖石上的是吴国权，也是白色衫裤，黑色皮鞋。其右坐藤椅者正是二年前毕业的马启臣，长衫马褂黑色皮鞋，两脚置置，微微前伸，一顶白色阔沿礼帽置于腿上，想必是长和市特产吧。最右侧站立的光头少年，双手交置身前，两脚分立，因为太湖石和花草遮挡看不出穿什么鞋，这位便是黄逸尘。

范鍾秀（1898—1966），字毓初，一名中秀，职名育初，云和乡戴家路（今属慈溪市长河镇宁丰村）人，与杨贤江老家下垫桥相距四百里，因此及往频繁，杨贤江便亲身体验了一回同乡合影：“摄吾姚师校同乡共六人之照。盖今夏四年级毕业马、崔二君亦在內也，有此庶可以志纪念。”一个月后的7月5日下午，杨贤江又“蒙舜五手招，啜酒食面”。当天日记有“舜五、器事二兄修业期满，行将赋归，余各赠以《四则问题解》一本，聊作纪念礼。蒙舜五复报以《英和新辞典》，卷帙甚厚，感甚兹焉。”的记载。马君即舜五，名启臣（1893—1970），柯东乡义学地（今属慈溪市宗汉街道周塘西村）人，毕业后历任余姚县视学员、余姚诚意高等小学校长、余姚县教育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建筑公司杭州木材厂厂长，1954年聘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员。崔君即器事，名友仁（1893—），后改名善工，余姚南城大黄桥树桥头（今属余姚市兰江街道舜南社区）人，毕业后历任余姚诚意高等小学、余姚县立高等小学教员、康节小学教员，余姚县教育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周行中学、龙山中学教师，1963年调入慈溪县文化馆工作。沈宗汉（1898—1968），原名芳年，字淑人，凤亭乡沈湾（今属余姚市兰江街道沈湾村）人，毕业后历任三山小学、诚意高等小学教师，凤亭乡中心小学、阳明区第二小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余姚县文教科副科长、文教局副局长、余姚县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吴克刚（1899—1973），谱名鹏年，一名立，字济柔，晚号潭西老人，别署几斋主人，林东乡潭河沿下沙（今属慈溪市桥头镇丰潭村）人，毕业后历任观海卫等地小学教员，1920年入华安火保险公同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回老家定居。陈鸿来，字房仲，余不详（同名者字秋声，柯东乡浒山河角今慈溪市浒山街道三碓桥社区人，毕业后历任余姚县立高等小学教员、三山学校校长、余姚县教学督学，不知是否同一人）。吴国权，字绪昌，余姚北乡人。黄逸尘，生平事迹不详。

这帧摄于一百多年前的照相，能够保存得如此之好，实属难得。它不仅是一份珍稀的罕见文献，同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珍贵史料。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许可以揭示出照相背后更多的史实和故事，着实令人无限期待。

本版投稿邮箱：
cixi2881002@163.com